

国家通用手语的文化源流、意蕴与时代使命*

杨雪¹ 苏永琳¹ 贾玲²

【摘要】国家通用手语是国家语言文字的组成部分,是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补充。在中华文化范畴下,国家通用手语生成于“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语境下的聋哑人通用手语,发展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建设语境下的中国手语,成熟于“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走向“手语是一门独立语言”的文化共识与国家认可。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国家通用手语体现了中华优秀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下,国家通用手语需要提升文化建设力、增进文化影响力与迈向文化现代化,为建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化话语体系贡献语言魅力和文化力量。

【关键词】国家通用手语;文化;源流;意蕴;使命

【中图分类号】H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10(2025)62-0043-12

Chinese National Sign Language: Cultural Origin, Significances and Missions in the New Era

YANG Xue, SU Yonglin, JIA Ling

[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 sign language(CNSL) is a vital part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character, and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Within the realm of the Chinese culture, CNSL originated from the common sign language of persons with a hearing or speech impairment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new ethnic culture of China”, and h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Chinese sign language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named “culture should serve the people and socialism”, and matured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China

*基金项目:1. 2024 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课题“广西特殊教育学校高质量推广使用国家通用手语的策略创新研究”(24YYC003);2. 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特殊教育普惠发展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BHA230160)

作者单位:1.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桂林 541006

2.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乌鲁木齐 830000

作者简介:杨 雪 博士研究生 讲师;研究方向:融合教育

苏永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融合教育

通讯作者:贾 玲 副教授;研究方向:手语、听障教育;E-mail:357560151@qq.com

into a cultural powerhouse, moving towards the cultural consensus and national recognition of “sign language is an independent language”. Nurtur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CNSL embodies the excellent material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of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plementing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s in the new era, CNSL sh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enhancing its level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impact, and moving towards 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oviding linguistic charms and cultural streng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sign language; Culture; Origin; Significance; Mission

[本文著录格式] 杨雪, 苏永琳, 贾玲. 国家通用手语的文化源流、意蕴与时代使命[J]. 残疾人研究, 2025(4):43-54.

CITED AS: YANG Xue, SU Yonglin, JIA Ling. Chinese National Sign Language: Cultural Origin, Significances and Missions in the New Era[J]. Disabil Res, 2025(4):43-54.

0 引言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宪法规定的责任,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2],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力推广和全面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进一步明确国家通用语言作为筑牢强国建设语言基石的重要价值^[3]。而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进程中,聋人因听力损失的限制往往需要通过手语转换才能习得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者直接使用手语表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此手语也成了聋人的“第一语言”。为了保障聋人群体特殊的语言文字权利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义务,近年来我国在政策文件中强调国家通用手语是国家语言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补充,并且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法律形式规定“国家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手语”。由此,国家通用手语成为聋人群体的“普通话”。

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每一种语言都反

映着产生它的文化”^[4],因而任何形式的语言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与丰富的文化内涵。从现有发展来看,国家通用手语是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应运而生的语言产物,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必然能够传播中华文化。然而,在其演化历程中,国家通用手语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困于“是否为一门独立语言”的争论中,致使其与中华文化的联结处于“似有若无”的状态。由此出现基于“聋人身份”仅将国家通用手语视为该群体独有的身份特质和聋人文化的核心象征现象^[5],并将聋人称为“文化上的少数群体”和“语言学意义上的少数群体”^[6]^[34]。但是,聋人群体并非处于隔离的、封闭的环境中,他们身处健听群体共同参与的社会中。过度强调国家通用手语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会导致其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底色在无形中被削弱,手语的通用性和无障碍性被消解,聋人与健听群体之间也会因文化差异出现文化区隔和文化壁垒现象,最终影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进程。例如,健听教师会因汉语与国家通用手语的表达逻辑有差异而出现“看手语”困难或难以认同聋人文化等情况^[7-8]。又如,绝大部分聋生只会在学校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手语^[9-10]。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片面地将国家通用手语置于聋人群体中解读其文化逻辑,而非将其放入中华文化框架中进行解

读,由此割裂了中华文化与国家通用手语的联结。研究指出,中华文化因其深厚的历史沉淀、独特的哲学传统以及精湛的艺术创作,能够为世界文明提供丰富且独特的文化解读视角^[11]。将国家通用手语置于中华文化的语境中进行文化解读,能够帮助聋人群体全面认知国家通用手语的文化底色,增强他们的精神“免疫力”和“抵抗力”,进而为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手语支持与文化食粮,为聋人群体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提供语言文化支撑。因此,本研究将国家通用手语置于中华文化情境下进行文化解读,并以中华文化对国家通用手语的塑造,以及国家通用手语对中

华文化的赓续的双向形塑融合视角,剖析与解构国家通用手语,深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意义与内涵,尝试探索、提炼国家通用手语的文化特质。

1 国家通用手语概念的文化源流回溯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家通用手语由聋哑人通用手语、中国手语演变而来,集中表现为“手语工具”的编撰与成型,最终实现了由物向概念转化和用语言再现概念的系统化嬗变^[12]。表1呈现了国家通用手语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变化与发展特征。

表1 国家通用手语概念的文化源流时间轴

时期	语言表征	官方 界定	语言 工具	聋教育倡导	手语 地位	重要政策 文件略举	相关 组织
20世纪50年代 至80年代末	聋哑人通用手 语/聋人手语	无	《聋哑人通用 手语图》	口语法	无	《关于修订聋 哑人通用手势 语工作方案的 通知》	中国聋哑人福利 会、聋人手语改革 委员会
20世纪80年代 末至21世纪初	中国手语	有	《中国手语》	口语为主、手语为辅 转向口语、手语、书面 语等多种沟通方式	聋人交际的工具	《关于在全国推 广应用〈中国手 语〉的通知》	中国残联、中国聋 人协会
21世纪初以来	国家通用手语	有	《国家通用手 语常用词表》 《国家通用手 语词典》	口语、手语、书面语 等多种沟通方式	国家语言文字 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重要 补充	《国家手语和盲 文规范化行动计 划(2015—2020 年)》	国家语委、中国残 联、国家通用手语 数字推广中心、国 家通用盲文研究和 推广中心

1.1 “聋哑人通用手语”概念及其身份印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实现这一文化建设目标,我国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措施,例如开展扫盲运动,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13]。当时全国成年人口中文盲占80%以上,方言分歧造成严重的社会交际障碍,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顺利推进扫盲运动,国家在文字改革方面开展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项语言任务^[14]。在此背景下,手语统一规范工作进入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领域^[15]。同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全国各地的手语差异大,群体之间沟通受阻,并不利于日常交流与参加集体生产。“为了广泛发动聋人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与解决聋人交流不便的实际需要,我国进行了手语统一规范工作^[15]。1958年中国聋哑人福利会成立聋人手语改革委员会,着手进行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和手语词汇的研究。1959年教育部、原内务部发布《关于试行规范化的“聋人手语”的联合通知》,中国聋哑人福利会在同年整理修订《聋哑人通用手语草图》^[16]。1960年,原内务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批转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关于修订聋哑人通用手语工作方案的通知》,

提出“在该年第四季度初,公布第三批通用手语单词”,为正式制定和推行聋哑人通用手语做好准备。随之,《聋哑人通用手语图》正式出版、《汉语拼音手指字母方案(草案)》公布施行,教育部、民政部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机构批准试行并推广。直至1987年《聋哑人通用手语图》更名为《中国手语》,手语表征才由“聋哑人通用手语”调整为“中国手语”。因此,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可称为“聋哑人通用手语”或“聋人手语”期,规范统一的手语指的是“聋哑人通用手语”。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并未改变手语不受重视的局面。首先,社会成员更多呈现出残疾“医学模式”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心理^[17]。他们会赋予残疾相对负面的社会评价,视残疾为人体非正常的病态,更是一种带来麻烦的社会问题^[18]。因此,聋人被视作要被医治和救助的患者,“防聋治聋”相关措施和治好“聋哑病”的医疗队宣传内容也成为《人民日报》的主流报道^[19]。受残疾“医学模式”和社会宣导的影响,社会群体会将聋哑人通用手语排除在主流语言范畴之外,将聋人称为语言学意义上的“少数民族”^[20],对手语产生显性歧视和排斥的文化心理。甚至社会群体会因其聋人烙印、聋人身份将手语视为“被救治的对象”,进而使手语失去存在的价值意义。因此有研究指出在手语中加入“聋人”是画蛇添足的表现^{[21][2]}。其次,聋哑人通用手语在新的文化教育制度中举步维艰。1954年教育部印发《“改编聋哑学校低年级语文教材小型座谈会综合记录”的通知》批评了手语教学的落后性,将聋教育语言由手语法转向口语法^[22]。自此口语教学原则在聋校教学中占据垄断地位,聋哑人通用手语则处于尴尬局面,其在课程设计和学术研究中都难以名正言顺^{[21][9]}。由此反映出手语规范统一工作与聋教育事业发展的割裂局面,从而加剧了聋哑人通用手语不受重视的不利局面。

在国际视域中,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手语已逐渐从被边缘化和受压制的状态转向复兴与繁荣。一方面,在聋教育事业中,听觉、手语和口语相结合的综合性教学模式重新被接受,并且新增了

手语翻译协会^{[23][74]}。另一方面,手语语言学开始出现并慢慢成为语言学研究领域之一,并且出现了“手语是一门独立的自然语言”论断^{[23][75],[24-25]}。这一突破使得手语的语言地位得到提升,并且推动了手语语言学研究的的发展。比较而言,我国这一时期的手语还处在聋教育的边缘化状态,聋哑人通用手语的用词也与国际聋教育专业术语不接轨,更没有涉及手语语言学分析和语言地位探究。这说明我国手语发展进程滞后于国际手语发展进程,手语研究同样滞后于国际手语研究。

1.2 “中国手语”概念及其文化情境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动文化改革,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征程^[26]。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明确了我国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这也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27]。在此背景下,手语的规范化工作也得以恢复。但是,原有的《聋哑人通用手语图》因绘图粗糙、印刷简陋、印刷质量不佳及国际交流“拿不出手”等因素已不能满足广大聋人群体的需要,面临总结、修订与定型^[28-29]。因此1987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手语工作会议”决定对《聋哑人通用手语图》进行增删、重绘,并更名为《中国手语》。随后,《中国手语》正式发行、《中国手语(续集)》增添、《中国手语(修订版)》成型。直至2011年手语表述才由“中国手语”变更为“国家通用手语”。因此,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可称为“中国手语”时期,规范统一的手语指的是“中国手语”(Chinese sign language),广义上指中国聋人使用的手语,狭义上指中国聋人群体内大部分聋人使用的手语共同体与手语交流体系^{[6][37],[30]}。“中国”二字指出了中国语境,强调我国的手语是立足中国国情、根植于中国思维和语言,是对中国的认识和实践做出抽象化、概括化的话语表达^[31],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要求。由此表明中国手语区别于其他国家手语、具有鲜明的本土性^[32]。中国手语的术语表达将“聋”视为文化身份而非残疾标签,进一步解决了历史遗留

的“聋哑人”污名化标签问题,也更符合国际语言表达习惯。

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国手语提供了诸多发展动力。首先,要求解放思想、摆脱“精神枷锁”的精神文明建设使得社会成员对残疾的认知增多、态度更加宽容^[33]。这为中国手语的推广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基础”。其次,特殊教育的文化教育制度建设为中国手语的规范化推广提供了实践基地。自1988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后,我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正式步入正轨。建设聋教育成为特殊教育建设的重要板块。一是口语教学法的垄断地位逐渐下降,手语教学法的重要性重新显现。例如,1993年的《全日制聋校课程计划(试行)》明确聋校的教学语言以口语为主,手语为辅^[34]而非单一的口语教学法倾向。2007年的《聋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施实验方案》进一步摒弃口语至上原则,提出增设沟通与交往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课程内容应包括口语、手语、书面语等沟通交流方式的训练。与此同时,聋校双语教学理念被引入国内,聋校教学语言的多样化选择逐渐成为趋势,对手语的讨论与关注增多^[35-36],我国也在国际支持下开展手语双语教育实验项目以强化手语重要性的认知及对手语及文化的认同^[37]。二是聋校成为中国手语的“教育容器”。2008年,《“十一五”期间在全国部分聋校开展推广〈中国手语〉试点工作方案(2008年—2010年)》印发,部分聋校开展了推广手语试点的手语研究和教学使用实践^[38]。同年7月,中国残联教育就业部等多部门在秦皇岛特教学校举办了全国部分聋校开展推广《中国手语》试点工作师资培训班,以进一步规范手语在聋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使用^[39]。

这一阶段,语言学和教育学领域开始对中国手语进行手语语言学研究,但对于“手语是否为一门独立语言”的探讨并未达成共识^{[16]44}。观点一认可手语的独立语言地位,强调手语和有声语言是相同的,都具备语言学三要素——语音(语形)、词汇和语法^{[40]17-20,[41]5-7}。观点二则否定手语的独立语言地位,认为手语不是语言^{[21]10,[40]17,[42-43]}。观点三则持中立态度,认为手语在本质上已具备语言的基本特

征,但在一定程度上和语言还有差距,所以将手语视为一种发展中的准语言^[44]。而在中国手语语言地位争论之际,国际手语已从手语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朝向手语语言地位的法律确立视域。例如,1981年瑞典通过立法承认手语的语言地位^[45];1991年联合国承认手语是一门视觉语言的语言地位^[46]。

1.3 “国家通用手语”概念及其文化尊重

21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得到高度重视并不断向前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建设更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建设文化强国”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集中表达且已迈出坚实步伐^[47]。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我国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建设和残疾人的语言文字权利。2011年5月,国务院批转《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将手语、盲文研究与推广工作纳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建立手语、盲文研究机构,规范、推广国家通用手语、通用盲文”。同年11月,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重大科研项目“国家通用手语标准研制”启动,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对手语使用状态进行调研。调研发现制定国家通用手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大多数聋人和教师)和强烈的时代发展需求,是符合聋人切身利益的必然举措^[48]。自此“中国手语”被调整为“国家通用手语”,手语规范化工作进入“国家通用手语”时期,规范统一的手语指的是“国家通用手语”(Chinese national sign language),即在听力残疾人语言生活和有关听力残疾人的公务活动、各级各类教育、电视和网络媒体、图书出版、公共服务、信息处理和手语水平等级考核中通行的手语^[49]。

首先,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国家通用手语的语言地位得到充分认可与尊重。2015年发布的《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15—2020)》是我国近年来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制定的关于残疾人语言文字工作的规划,明确指出国家通用手语是“国家语言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发布的《关于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通知》又指出国家通用手语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补充”。二者均从国家意志层面确定了“手语是一门独立的语言”,也将国家通用

手语从“个体”视野推向公共服务领域。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国家通用手语是一门独立语言的认识趋于理性和客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不断倡导普及手语^{[40]10, [41]5-6}。然而遗憾的是,我国还未在法律层面明确国家通用手语的法律地位。国际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球已有66个国家通过了与手语相关的法律,确立了手语的法律地位^{[50]25}。为使国家通用手语跻身国际视域并推进国家通用手语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国家通用手语立法势在必行。

其次,我国的残障模式正由医疗模式转向社会模式,注重通过社会力量深度改革残疾人的生活环境以促进残疾人发展^{[51], [52]12}。为此,残联系统、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教育部门、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等社会各个层面均通过影视制作、社会宣传、教育教学、书籍出版等“文化生产手段”改变已有认知、排除社会不平等和排斥现象^{[52]17},为聋人的社会融入和国家通用手语的普及推广提供了文化氛围和社会支持,实现了国家通用手语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协同发展。

最后,国家通用手语已充分融入我国的文化教育制度中,成为特殊教育学校的重要教学语言。2016年教育部发布的《聋校义务教育沟通与交往课程标准(2016年版)》提出聋生要“初步学会口语、手语、笔谈等多种沟通方式,具有在不同情境中与人沟通交往的实际能力”。2024年《中国残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快在特殊教育学校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通知》进一步指出推广使用国家通用手语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基本义务,并要求聋教育教师普遍掌握国家通用手语。此外,普通教育体系为国家通用手语提供了全方位保障。例如,《视力残疾和听力残疾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办法(试行)》适应了聋人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特殊需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纳入了“手语翻译”专业,以及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残联发布了《国家通用手语水平等级标准及测试大纲》,都为健听群体和聋人之间的双向融合提供了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支持。

2 国家通用手语现代文化意蕴的演绎共生

作为聋人通向中华文化的语言中介,国家通用手语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已从词汇角度指出国家通用手语能表达中华文化中的民俗文化、汉字文化和传统艺术文化三维度的精神文化^{[50]167-196}。但历久不衰的中华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形成的一个庞大而严密的体系^[53]。国家通用手语不可避免地承载着这三个层级的中华文化,进而传播与继承中华文化。并且,“手”是独特的文化符号,央视公益广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手”篇》通过“手”呼吁树立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认同、肩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54]。国家通用手语作为“手”的语言集合体和文化属性“继承者”,更能彰显中华文化意蕴。

2.1 国家通用手语保存与传承中华优秀的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蕴含在中华民族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中的文化,是中华民族运用物质以满足各种需要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中囊括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例如传统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农耕文明、传统服饰等。

其一,中华优秀的物质文化以文化镜像的方式保存在国家通用手语中,以反映特定时期的中华物质文化面貌。其中,国家通用手语词目是中华物质文化最显性的承载物(见表2)。例如,在传统建筑文化的保存上,“人字坡顶”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显著特点和精华所在,能表现出顺遂自然的谦卑以及庇护之意,承载着中国的东方哲学思想^[55]。国家通用手语就双手搭成“人”形模拟“屋顶状”或“屋檐形状”,还原了“人字坡顶”的精髓。又如,在传统服饰文化的保存上,旗袍是中国女性服饰的代表之一,也是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服饰之一^[56]。国家通用手语在“旗袍”词目上也将旗袍服饰的精髓——“门襟”呈现出来,并且这一传统服饰还出现在了“中国”手语上。类似的手语还有“制服(中山装)”等,均能通过手势呈现出中华传统服饰特征。再如,饮食文化的手语保存上,原有的“西藏”手势不能显现出藏族人民的饮食习惯,而聋人实际打法则以做糌粑的动作呈现,因此国家通用手语做了修订,以生

表2 手语词汇中的中华物质文化例证

范畴	词目	手势来源	
		《中国手语》	《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
中华传统服饰	旗袍	一手打手指字母“Q”的指式,由领口向下移至腰部,仿旗袍的外形。	一手打手指字母“Q”的指式,从领口向下移至腰部,仿旗袍外形。
	中国	一手伸食指,自咽喉部顺肩胸部至右腰部滑下,以民族服饰旗袍的前襟线表示中国。	一手伸食指,自咽喉部顺肩胸部滑至右腰部,以民族服饰旗袍的前襟线表示中国(中国打法之一)。
中华饮食文化	筷子	一手伸出食、中指,在口前边划动边夹几下,如同用筷子吃饭状。	一手食、中指分开,指尖朝下,边向嘴部移动边夹动一下,表示筷子。
	西藏	无	左手横伸;右手在左手掌心上仿做糌粑的动作。
古今交通	运河	双手横伸,五指微曲,掌心向上,左右交错移动。双手侧立,掌心相对,间距约20厘米,向前做曲线形移动。	双手横伸,掌心上下相对,向一侧移动一下;双手侧立,掌心相对,相距窄些,向前做曲线形移动。
	高铁	无	左手食、中指分开,指尖朝前,手背向上;右手五指撮合,指尖朝前,从左手背向指尖方向快速移动,仿动车、高铁车头外形和高速运转的状态。
传统建筑	家	双手搭成“Λ”形	双手搭成“Λ”形
	宫殿	双手搭成“Λ”形,然后左右分开并伸出拇指、小指,指尖朝上,如屋檐状。	双手搭成“Λ”形,然后左右分开并伸出拇指、小指,指尖朝上,仿屋檐形状。
农耕文明	锄	一手五指并拢弯曲与掌心成直角,指尖朝下挥动几下,如用锄头锄田。	一手五指成“J”形,指尖朝下,挥动两下,如用锄头锄田状。
	耙	一手五指弯曲,手背向上,往后移动,如用耙子耙地。	一手(或双手)五指弯曲,掌心向下,向后移动,如用耙子耙地状。

注:包含两个及以上手势的词目仅呈现与“物质文化”相关手势。

动形象的手势保存我国的传统饮食文化及习惯。

其二,国家通用手语通过手势的即时互动与跨时期传递,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的物质文化,这也是语言交际功能的发挥。在跨时期传递上,20世纪50年代的手语以反映社会主义初期的物质文化为主,20世纪80年代的手语则以反映改革开放之下的物质文化为主。而在国家通用手语传承中华物质文化的不断积累之下,当前国家通用手语既能回顾过去的物质文化,也能反映当下的物质文化。例如,显现农耕文明的“锄”“耙”与展示现代科技文化的“高铁/动车”“多媒体”“耳机”等。从表2列举的大部分国家通用手语手势在传承过程中的特征可以发现,大部分的中华物质文化能够“从一而终”地传承,例如“家”“锄”。这说明国家通用手语在物质文化的传承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还有一部分国家通用手语会进行调整以使其更具文化的传承性,例如“西藏”“运河”等。

此外,国家通用手语也以“增加新的”方式增加了更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手语词汇以表征我国现代的物质文化,这也是国家通用手语规范化工作面临的新历史任务^[57]。由此使国家通用手语在保存中华物质文化的基础上依然不断创新。

2.2 国家通用手语展现与反映了中华优秀的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借助物质所体现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中充盈着制度文化,例如中华传统礼仪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等(见表3)。

其一,国家通用手语能真实反映出我国优秀制度文化的显著特征。从传统礼仪来看,我国是礼仪之邦,非常注重日常礼仪表达。国家通用手语为反映传统礼仪制度提供了可视化的肢体语言符号。例如,“作揖”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人际交往礼节,承载儒家传统“主敬”“谦让”等文化意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58]。相关研究也指出复兴传统礼

仪的最佳选择是推行“揖让之礼”^[59]。国家通用手语将“揖让之礼”转化为“庆祝(拜年、祝、贺)”“庆祝会(典礼)”的手势。在家庭婚姻制度文化上,国家通用手语以手指各部位及位置次序将家庭伦理进行可视化处理,强调了血缘关系的层级与亲疏,

高度契合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例如在“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手语组合和相对位置上,父亲为“右手拇指”,母亲为“右手食指”,姐姐和哥哥为“右手中指”,而弟弟和妹妹为“右手小指”,由此凸显出“长幼尊卑”的家庭秩序和礼节。

表3 国家通用手语词汇中的中华制度文化例证

范畴	词目	手势	制度文化意蕴
礼仪	庆祝	双手作揖,向前晃动两下,面露喜悦的表情。	揖让之礼
	敲	一手食指弯曲,指背朝外,敲动两下。	叩门之礼
家庭	爸爸	右手伸拇指,指尖左侧贴在嘴唇上。	长幼尊卑的家庭秩序
婚姻	结婚	双手伸拇指,虎口朝上,指面相对,弯动一下。	拜堂之礼
教育	开学	双手并排直立,掌心向外,然后向内转动90度,掌心相对;双手斜伸,掌心向内,置于身前。	现代教育制度
	学制	双手斜伸,掌心向内,置于身前;双手直立,掌心左右相对,向一侧一顿一顿移动几下。	

其二,国家通用手语在实际运用中反映中华优秀的制度文化。一方面,国家通用手语会赋予传统的制度文化现代交流功能,使其更具现代性与时代性,以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例如,中华传统礼仪中的抱拳礼在“恳求(恳请、哀求)”的手势中表现为“双手抱拳,向后晃动一下,面露恳求的表情”。又如古代叩门之礼在“敲”的手势中表现为“一手食指弯曲,指背朝外,敲动两下”。再如“庆祝”在还原揖让之礼的同时也具有现代称谓价值,即它可以用来表示姓氏‘祝’和‘贺’。另一方面,国家通用手语也在不断革新以反映现代制度文化。例如,《中国手语》(修订版)记录了“中农”“富农”,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村阶级划分的社会等级制度或潜在的经济规则。随着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农”“富农”阶层已不复存在,国家通用手语就删除了大量类似已经过时、不符合社会主义先进制度文化的手语。又如在文化教育制度上,融合教育已成为我国文化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呈现融合教育相关的现代教育制度文化,“融合教育”“随班就读”“资源教室”等词目已增加进来。

2.3 国家通用手语传播与普及中华优秀的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伦理观念、审美意识和哲学思想的直接体现,在五千年的文明积累中我国形成了丰厚的精

神文化,例如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中国哲学、宗教文化等(见表4)。

其一,国家通用手语能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语言符号系统视角来看,汉字是汉文化的产物,也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用手语则通过仿汉字手势、书空汉字手势、“仿写+书空”的手势等方式传播了汉字文化^{[50]187-190}。例如“千”“万”的手势呈现了书空汉字,“仁”“品”的手势则传递了汉字的完整字形。与此同时,国家通用手语也在传播我国汉字文化中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自诞生以来就起到了提高聋教育教学质量的作用^[60]。1963年我国公布施行《汉语手指字母方案》,以汉语手指字母代表字母并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拼成普通话,形成了手语指语。2019年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汉语手指字母方案》替代1963年发布施行的原方案。修订后的方案更具科学性、规范性,更加符合现实需要^[61],也能进一步在聋人群体中传播汉语拼音。从宗教文化来看,国家通用手语能够传递我国古代的宗教制度文化。例如,佛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木鱼正是佛学文化的重要象征^[62]。国家通用手语取其“木鱼动作”精华,在“寺庙”和“佛教”的手势中呈现“左手直立,掌心向右;右手虚握,做敲木鱼的动作”,由此反映出我国的佛教制度文化核心特征。

表4 国家通用手语词汇中的中华精神文化例证

范畴	词目	手势	精神文化意蕴
语言	千	一手伸食指,指尖朝前,书空“千”字形。	汉字书空
文字	本科	双手侧立,掌心相贴,然后向两侧打开;一手打手指字母“K”的指式。	汉语拼音
价值观	和谐	双手直立,掌心左右相对,五指微曲,从两侧向中间移动;双手横立,掌心向内,五指张开,边向下转动边食、中、无名、小指弯曲,指尖抵于掌心。	中华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友善	双手伸拇指,互碰一下;右手直立,掌心向右,小指外侧贴于胸部正中,从上向下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宗教文化	寺庙	左手直立,掌心向右;右手虚握,做敲木鱼的动作。	佛学文化
	道教	左手五指弯曲,指尖朝下,抵于头顶正中;右手食指横伸,插入左手中、无名指指缝间;双手五指撮合,指尖相对,手背向外,在胸前向前晃动两下。	道教文化

其二,国家通用手语持续更新、传播新时代优秀的中华精神文化。就价值观体系的塑造来看,国家通用手语新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容,通过手语互动帮助聋人群体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国家通用手语对于塑造边疆地区聋人群体的价值观来说格外重要。例如,聋人群体通过“傈僳族”“阿昌族”等地方民族相关手语词目,能够了解各民族特色的同时增强中华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也能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精神的更新方面,我国在2012年提出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就增加了体现中国精神的相关词目。例如,为强化“爱国”精神,国家通用手语在呈现“泛指的爱”手势的同时,专门“以民族服饰‘旗袍’的前襟线表示中国”的手势表示爱中国。这一手势将身穿旗袍的女性比喻为祖国,隐喻“祖国—母亲”的心理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选择和精神寄托^[63]。

3 国家通用手语的时代使命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阐明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内涵^[64]。国家通用手语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不仅承载着消弭社会隔阂、构建无障碍社会的现实责任,更需要通过视觉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全方位履行我国的新文化使命。

3.1 提升文化建设力,助推文化繁荣样态

文化繁荣是我国新的文化使命的第一层级,国

家通用手语应助力文化繁荣样态的构建,即通过国家通用手语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产品走向丰富多样和蓬勃兴盛^[65]。然而,尽管我国开展了国家通用手语推广与应用的语言文字事业^[66],但我国的聋教育事业却备受冲击。一方面,因聋致残率明显下降^[67],聋教育环境中的生源自然减退,教师国家通用手语能力参差不齐,二者加剧了聋生国家通用手语习得困境,甚至出现手语使用的年龄断层现象。同时,国家通用手语尚未在融合教育中发挥教育与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国家通用手语的文化产业、产品极其有限,我国在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等方面难以满足聋人的文化需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化繁荣样态共建。为此,国家通用手语需要提升其文化建设力。

首先,在文化事业建设上,国家通用手语应持续推进推广普及工程,并且在聋教育事业中突破传统的“特殊教育”的制度框架,实现基于国家通用手语的普特融合建设。例如开展融合教育教研活动,让国家通用手语和聋生走进普校。同时聚焦国家通用手语人才的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机制的完善,以提升教师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手语的能力。特别是在手语翻译需求较大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手语翻译人才培养格外重要。其次,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建设,国家通用手语应鼓励广泛的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其中,并倡导由国家层面提供一定的资金与制度支持。最后,国家通用手语应积极加强文化产品建设,例如手语相关的书籍、影视作品、文创产品、艺术品等。特

别是在数字时代,国家通用手语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技术形成诸如手语数字人、国家通用手语词典 APP 等数字化文化产品。

3.2 增强文化影响力,服务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回归到国家通用手语与中华文化的联结关系上,国家通用手语承担着中华文化传播、交流、创新等文化功能,也就意味着国家通用手语能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但目前来看,国家通用手语的文化影响力明显不足。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成员对手语文化功能的认知与理解并未形成普遍共识。例如,有研究者以割裂的方式看国家通用手语,有偏向地将文化功能指向地方手语而非国家通用手语,进而忽视了国家通用手语的文化功能^{[68][64-69]}。另一方面,在国际手语领域中国家通用手语的地位有待提升,特别是在手语立法方面我国始终滞后于国际领域。为此,国家通用手语需要进一步提升文化影响力。当务之急是通过多种路径改善对国家通用手语的不利认知,使社会群体全面认识其对中华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文化功能。例如,开展基于国家通用手语的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及活动、国家通用手语与中华文化的联结开展相关的学理研究和实证调研等学术研究。由此阐明国家通用手语服务文化强国的逻辑联结与价值意蕴,为国家通用手语文化功能的普及与推广提供理论与循证支持。国家通用手语的相关工作者需要通力合作以推进国家通用手语从学科领域的语言地位认可走到国家政策法律现实。在此基础上,国家通用手语更需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对话,尤其需要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华文化故事。

3.3 迈向文化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升华与远景目标。在实现文化繁荣和文化强国的目标中必然会朝向我国新的文化使命的终极目标。为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国家通用手语应迈向文化的现代化,即坚持文化的主体性,这是国家的文化生命。首先,国家通用手语需要帮助聋人群体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绝不只是被窄化的“聋人文化”认同。对中华文

化的文化认同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的文化自觉前提和文化自信根基^[69]。因此,国家通用手语要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的功能与价值,帮助聋人由聋人文化认同走向中华文化认同。其次,国家通用手语需要进一步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从国家通用手语词目来看,一方面,国家通用手语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记录当代文化,维护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与发展的根本。另一方面,手语本身就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国别差异,国家通用手语在呈现我国本土文化的同时也会展示外来文化。在朝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国家通用手语需要以中华文化的传承为核心,进一步融合以上两种关系,实现文化内容的现代化。最后,国家通用手语需要实现文化主体的现代化,使聋人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担当者和实践者。同时发挥国家通用手语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上的作用^{[68][65]},帮助聋人群体与健听群体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文化共同体。

4 结语

国家通用手语浸润在中华文化语境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20世纪50年代,在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背景下,聋哑人通用手语破茧而出,成为开展聋人扫盲工作的重要语言工具。20世纪80年代后,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建设背景下,中国手语革故鼎新承担聋人参与社会改革与对外交流的责任。发展至今,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语境中,国家通用手语应聋人需求而生,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补充。透过国家通用手语,可以瞥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毋庸置疑,国家通用手语是中华文化的“视觉容器”。目前,我国已提出新的文化使命,在此背景下,国家通用手语需要提升其文化建设力、增进其文化影响力并迈向文化现代化,最终助力中华文化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终极目标。全社会也必须尊重、支持、发展国家通用手语的文化使命,

为建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化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204.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5-01-06].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3] 周为.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 筑牢强国建设语言基石[N].中国教育报,2024-10-22(1).
- [4] 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28.
- [5] 赵栅凌.聋人文化视域下听障儿童音乐教育现状的审视与突围[J].四川戏剧,2019(7):161-164.
- [6] 沈玉林.手语多样性、标准化及手语语言建设的问题与思考:从荷兰 CLSLR2 会议看中国手语规范化工作[J].中国特殊教育,2008(6):34-40.
- [7] 周瞿.我国国家通用手语推广现状调查:以山东省聋校教师为例[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20.
- [8] 张桂林.聋校教学中通用手语运用的困境及对策[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0(4):48-51.
- [9] 李祥蓉.听障中学生运用国家通用手语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四川省A特殊教育学校为例[D].重庆:西南大学,2020.
- [10] 李子晗.新疆聋校师生国家通用手语的使用现状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22.
- [11] 蔡晓璐.中华文化基因视域下礼乐精神的艺术呈现与价值构建[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24(2):59-72.
- [12] 张謇.作为意指实践的文化: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及其评价[J].外语研究,2018,35(2):87-93.
- [13] 王铁钢.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探索[J].求索,2012(6):160-161.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 国家语委关于印发陈至立国务委员在纪念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 5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EB/OL].(2006-05-24)[2025-05-21].http://www.moe.gov.cn/jyb_xxgk/gk_gbgg/moe_0/moe_1133/moe_1237/tnull_17032.html.
- [15] 中国残疾人杂志社.国家通用手语研究的背景与初心:国家通用手语系列介绍(一)[EB/OL].(2019-09-29)[2025-05-11].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A1Njg5MGg=&mid=2650433997&idx=4&sn=0619babffc0e2479fc9c8e4a793d5899&chksm=8358ec1eb42f650835300dcfa1f25ef0ad00fe950fa60cf9a4fcc013e85ada2ee060540283be&scene=27.
- [16] 黄伟.手语发展 60 年[J].语言文字应用,2009(3):42-44.
- [17] 邓猛,张瑶,张玲.我国特殊教育对象范围演进及理论范式变迁[J].残疾人研究,2024(4):59-67.
- [18] 陈四海.汤姆·莎士比亚的具身残疾本体论及其理论效应[J].中国特殊教育,2021(8):18-22.
- [19] 刘祎航.基于《人民日报》媒介矩阵的听障群体形象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0.
- [20] 沈玉林,吴安安,褚朝禹.双语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8.
- [21] 徐铁卫.中国手语的概念及内涵[J].中国特殊教育,2004(2):10-13.
- [22] 朱宗顺.特殊教育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28-231.
- [23] 盛焕,林皓.美国手语语言规划历时演变考察[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22,36(1):72-78.
- [24] 邓慧兰.聋童语言获得与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语言科学研究之知识转移[J].语言科学,2014,13(1):27.
- [25] 靳开宇,张宁生.手语语言学研究探索[J].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2015,23(5):562-563.
- [26] 岳奎,张鹏启,李敏.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特征及经验启示[J].理论探讨,2023(2):103-110.
- [27] 杨奎.以人民为中心: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EB/OL].(2024-03-13)[2025-06-28].<https://www1.xinhuanet.com/politics/20240313/f10d0435cecc412d9ff928dd3e9a5bc8/c.html>.
- [28] 富志伟.改革开放使我走上领导岗位[N/OL].新京报,2018-05-22[2025-05-26].<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5152893114475.html>.
- [29]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中国聋人协会.中国手语(修订版):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6.
- [30] 高宇翔,顾定倩.中国手语的发展历史回顾[J].当代语言学,2013,15(1):94.
- [31] 杨颖.短视频表达:中国概念对外传播的多模态话语创新实践[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11):160-161.
- [32] 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54-55.

- [33] 代依晴,俞良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目标的话语变迁[J].湖北社会科学,2023(11):11-17.
- [34] 张福娟.特殊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23-224.
- [35] 沈玉林.改进教育方式 全面服务聋童:“聋儿双语教学研讨会”述评[J].现代特殊教育,2001(9):8-9.
- [36] 吴支奎.多元化:聋校教学语言选择的必然趋向[J].现代特殊教育,2001(9):4-5.
- [37] 欧纳,吴安安.与中国聋校的沟通和合作:中挪手语双语教育的合作经验[J].中国特殊教育,2009(4):59-69.
- [38] 黄培森.中国特殊教育史略[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60-163.
-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国部分试点聋校推广《中国手语》师资培训班开班[EB/OL].[2025-05-15].http://www.moe.gov.cn/s78/A18/s8357/moe_808/tnull_36853.html.
- [40] 吕会华.中国手语语言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
- [41] 郑璇.手语基础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 [42] 邱云峰,姚登峰,李荣,等.中国手语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8:21.
- [43] 郑璇.中国聋人手语的语言地位[D].武汉:武汉大学,2005.
- [44] 李尚生.重审手语的语言资格[J].中国特殊教育,2000,28(4):4-5,32,41.
- [45] 林皓,魏丹,赵蓉晖.手语立法的国际比较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8(2):36-43.
- [46] 刘润楠.中国大陆手语语言学研究现状[J].中国特殊教育,2005(5):26-29.
- [47]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5(5):1-2.
- [48] 刘艳虹,顾定倩,程黎,等.我国手语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3(2):35-41.
-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1.
- [50] 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国家通用手语探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
- [51] 张琳,葛忠明.从排斥到融合:残障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未来转向[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0(3):95-101.
- [52] 赵森,易红郡.从个人到社会:残疾模式的理念更新与范式转换[J].残疾人研究,2021(3):12-22.
- [53] 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与使命[M].北京:中华书局,2017:209-211.
- [54] 中央广电总台总经理室.央视公益广告 中华文化,心手相传[EB/OL].(2018-10-23)[2024-05-29].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g2MTA4MA==&mid=2651794400&idx=2&sn=2d22424c7be6ea34fc85bc9b7aa968cc&chksm=bd45d9978a325081627823aaa9555515e8c4462f52c37f20749b9d077cfbf6e3546c587d78e6&scene=27.
- [55] 宋寅.中国古代建筑屋顶及其曲线的艺术[J].中国房地产,2002(10):71-72.
- [56] 李迎军,刘元凤,郑嵘.旗袍词义解读[J].艺术设计研究,2017(1):36-40.
- [57] 王一博.我国通用手语词典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残疾人研究,2022(无障碍增刊):55-58.
- [58] 潘祥辉.“揖让而天下治”:中华传统揖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5):53-62.
- [59] 张鑫,李建平.“拱手”与“作揖”:关于龙年春晚倡议传统礼仪的讨论[J].语文建设,2012(5):41-42.
- [60] 吴玉章.汉语拼音方案在各方面的应用[J].文字改革,1964(3):1-4.
-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和《中华通韵》两项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正式实施[EB/OL].(2019-11-01)[2025-05-23].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10/t20191031_406311.html.
- [62] 孙秀青.追寻佛学的中国之路:中国文化与佛学文化通融之法器木鱼考据[J].东南学术,2012(3):250-256.
- [63] 潘祥辉.“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J].人文杂志,2018(1):92-102.
- [64]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1).
- [65] 刘建军,耶旭妍.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文化使命”[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2):23-30.
- [66] 程凯.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是残疾人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J].残疾人研究,2018(3):3-7.
- [67] 顾天成,李恒.聚焦全国爱耳日:我国因聋致残率明显下降 老年性耳聋亟待干预[EB/OL].(2023-03-02)[2025-05-14].https://www.news.cn/2023-03/02/c_1129409124.htm.
- [68] 张帆.通用手语建设与地方手语保护的思考[J].现代特殊教育,2016(16):64-69.
- [69] 刘振怡.文化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的建构[J].理论月刊,2024(9):30-36.